用西方的指标体系衡量中国，没有意义！（下）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04-07[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0771&idx=2&sn=93da02c1418d131609553413c8517819&chksm=8bb07322bcc7fa349a9aabdc758fc8ede723751a4cb939a1feed34af09c7c449e5a602d4fab3&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27)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何婕

嘉宾：

张维为：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叶青林：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马泽晨：春秋研究院研究员

洪琳：国广首席国际时事评论员

作为超大型国家的中国，观察中国、读懂中国并非易事，如果在西方话语下，用西方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中国，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呢？

主持人何婕：张维为老师特别强调在当下观察中国，不要盲人摸象，当下这个时间点它透出了一种紧迫性。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还在用以往的一些标准来观察中国问题，用西方的一些体系来观察中国问题的话，会怎样呢？

张维为：**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首先要准确地读懂自己，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中央的定位是准的，就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个伟大的飞跃。我觉得这个是相当精准的。那么我觉得对国外也是一样的，你怎么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传达出去？就是更好的更自信的平等的交流，现在蛮重要的，因为确实在一个关口上。

主持人何婕：张老师也说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破”，而且我们马上要做的事情是“立”。

叶青林：我特意去搜集了一些还比较尖锐的问题。有中国人认为说，比如说中国的网购快递是很奢侈的事情，是建立在资本家剥削快递小哥的基础之上，你怎么看？

张维为：这个人要与时俱进，要与时俱进，实际上快递小哥现在中国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看到是，第一，他通过自己的勤劳，通过自己的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另外就是他也得到一种尊重你看这次习主席在元旦献词里边都专门表扬了，向他们表示问候。真的，这是中国一个非常新的现象，而且据说总体工资还相当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是从剥削角度来说，而是说是他多劳多得。我觉得这个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的。所以这个提问的人他要与时俱进。

叶青林：还有五险一金呢。

张维为：对，还有五险一金。

马泽晨：我有一个感触，就是现在西方的很多的这些统计方法的设立，都是一些百万到千万级人口的国家提出的概念。那么在数学里头，可能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说，当人口成一个线性的增长的时候，你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只需要把这个倍数增加上去就可以了。但我一直有一种疑问就是说像到了亿级像美国这样或者是像中国或者印度这种十亿级人口的这种国家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抛弃这种概念？也就是说我不能把原有的方法根据人口的增长倍数简单加权就能得到一个我想当然的结果，而是说它可能在就像超过了光速的运动物体一样，它会超出了原有的体系的认知。您觉得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张维为：它是一个质的变化。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到这样的规模之后，你再进行大象、跳蚤的比较，就像拿一个玻璃杯和一个苹果进行比较，你当然可以化元到说都是分子、原子，但这个比较意义非常小，你要找类似的类型。实际上我跟纽约时报记者的对话，我就举这个例子，我说我自己如果开办一个民办的补习学校也叫学校，恐怕就五六十个学生，对不对？然后我办一个复旦大学这样的大学，3万学生，管理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国家治理也是一样的，差别大了去了。

洪琳：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有的时候看这些指标，这些数字和我们平时身边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感知能力出现了问题，还是说这个指标体系本身存在问题？和平稳定安全这样的因素怎么去量化？你比如说同样的一个东西，在不同的环境里，和平安全的环境里和弱乱的环境里面，它是不一样的估值，就我们传统的话，盛世存古董，乱世存黄金，黄金还是黄金，古董还是古董。但是古董可能在那个战乱时代连一个馒头都换不来。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很多资产的估值，土地、房屋、古董。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是安全和平稳定的溢价。

张维为：对。**西方采用这种所谓新的社会科学的方法，也是面临这样一个窘境，就是它为了数学上能够建立起来，他必须限定一些variables，一些要素，**这个变量东西你去掉一个加一个，它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特别同意刚才洪琳老师讲的这点。我们中国人一些套话，一些我们都听得习以为常的东西，都不愿意再说的东西。你跟西方讲一讲，这是我们的智慧，你看就是和平与发展，就这么个概念，我们都讲了几十年了。

主持人何婕：确实是，刚才我们也已经说了，我们通过一段的实践，就越来越觉得西方的一些标准，西方的一些这种体系或者他们的一些提法已经不太能够解决和解释中国的问题。那问题是我们还可以从哪些侧面再来观察中国的问题？哪位有提问的可以举手给我。

观众：张老师好。之前有看过您和亨廷顿的学生福山的论战，我觉得亨廷顿提出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能力。改革开放40周年来中国的发展肯定也是有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政治秩序是稳定的这个原因，但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出现了很多的这样的新兴利益的这样的集团，它们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我觉得是需要把它们扩大政治参与到制度的过程中，想问您一下中国模式是怎么把这些不同的新兴利益集团吸纳到现有的政治制度当中去，然后让它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合理的表达呢？谢谢。

张维为：很棒很棒。问题很有水平。我想是这样的，你仔细看，实际上在江泽民时期提“三个代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其中一个代表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向新社会阶层开放，我不知道马云是什么时候入党的，但不管怎样马云也是共产党员的一部分。

叶青林：政协里面有个界别，就是新社会阶层。

张维为：对。实际上就是新社会阶层，中国是用什么方法来把它们纳入这个政治，或者我们叫协商民主的系统**。一个就是我们的协商民主的一部分，最典型的标志，当然就是政协本身，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另外整个中国共产党，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传统，我们叫做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么你比方说最简单，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你比方说现在滴滴打车在中国是合法的，你到德国就不合法，因为德国Uber优步，Uber来了之后，跟现有的出租车行业形成了冲突，那么西方的做法典型的做法就是打官司，打官司，西方这个法制社会，你只要在那生活过你就知道，它是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那么一般说这个官司大概率是出租车司机赢，Uber会输，结果它就被禁止了。德国、法国我知道现在都是这样的，没有异议，那么中国是把它合法化了。

虽然有很多问题，我们在发展中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那么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有这么一个协商民主的机制，你滴滴可能在政协、在人大、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都没有代表，没有关系，但你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需求，新的利益或者新的一个很重要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共产党要考虑这个问题。民意来了之后，他可以专门去可能是政协提案，可能是网上的一篇文章，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他就来进行调研，然后可以叫你来，请进来，对不对？到市政府里边来座谈，谈你们的诉求，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去做调研，这样几个来回之后，寻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法，传统出租车行业能接受，滴滴也能接受，公众也能接受，就协商民主的成功的案例。然后你说还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抱怨什么东西，但是这些在发展中来解决，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说明这个系统有这个办法来处理这些问题，对。

主持人何婕：从大家的问题当中真的能够感受到大家很认真的在思考，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来感受我们的思考，来，这位朋友，请起。

观众：主持人何婕好，张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你研究了中国道路和中国现在的制度，能不能避免因贫富分化引起的社会动荡，导致的大国兴衰的那种历史规律，谢谢。

主持人何婕：好，谢谢您平时喜欢看历史研究历史吗？

观众：喜欢。

主持人何婕：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观众：我是做汽车油漆检测的。

主持人何婕：大家看到吗？所以其实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只要有这个兴趣爱好，而且只要关注中国发展都能找到自己思考的角度，真是太棒了，您请坐。

观众：谢谢。

张维为：对，实际上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要确实是关注贫富差距的问题。但同时我也觉得就是中国基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这方案可以完善。我老这样说的，**首先我们这个指标体系要创新，不能完全用刚才讲的基尼系数，我们要有新的指标体系**。那么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就发觉中国大致这样的，当初最早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邓小平他提的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富起来。一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更多的人所有的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他完整的论述。你现在回头看就第一部分，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富裕起来，这个我们基本做到了。**过去将近20年，整个中西部地区发展都比沿海要快，你可以看感觉得出来的，这实际上也带动了当地贫困人口的脱贫。**我们现在是2020年要解决所有的照现在标准的贫困，这个是了不起的，我叫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现在7亿4千万人脱贫了。所以这方面进步也很大，但是在先富的人带动所有的人共同富裕，这个我们现在还在探索，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更有效地做到，虽然已经有不同的探索，但还没有做到最理想的状态。但好在就是我们这个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在朝这个方向走。一讲到贫富差距讲到什么，很多人马上就会激动起来，但你一定要看宏观的一个把握，要防止这种很简单的激进的思潮。**总体上中国是在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在走，多少人命运得到了改变，这是全世界没有地方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而且前景还继续看好。**所以我觉得可以跳出，如果你说是一种循环的话，可以解决。

主持人何婕：包括现在国家还在大力抓精准扶贫，这个也是我们一种特殊的做法，您走过那么多国家，有没有地方也这样去扶贫呢？

张维为：**精准扶贫实际上是很高的一个要求，首先你的贫困的人数要相对比较少，如果你7亿人就没法搞精准扶贫。第二，你政府能力要比较强，你要能够管到基层，**这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它有个中央政府，你只要实地考察过，它可能就能管一个首都，我们到贵州最穷的地方，我们农民贫困户他都有银行卡，政府这些钱打到他卡上去，这是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数字管理。所以本身能够提出精准贫困，然后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才能这样做。

主持人何婕：改革开放40年让7.4亿人口脱贫，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精准扶贫。所以其实刚才这两点结合起来也是在回答这位朋友的担心，当然我们都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就是可以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马泽晨：我有一个问题想追问一下张老师，是不是所有的经济体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会不可避免地使得最上头顶尖的人会快速地攫取财富，而忽略了后面人的所有的收入的速度？难道说这是一个无解的话题吗？

张维为：我是这样看的，实事求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过去40年如果你算一个总账，每年是平均增长9.5%，那么像这样一个增长率的话，它必然意味着每年都要创造一大批的富人、企业家，否则不可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

叶青林：我有一个关于贫富差距的观察，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自己特别感动。一个还不到40岁的年轻企业家，几亿的资产，前段时间说，现在中国对于中小企业的税越来越重了，很多人又往外跑了，活不下去了怎么办？我不是在论坛上，在私下里他说，我们这些年积累的财富不就是政策带来的红利吗？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要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人富起来。所以这些税不就是在实现当初我们富起来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吗？我特别感动，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人，而且周围的很多年轻企业家在附和。

主持人何婕：对，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也好，年老的企业家，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他们也回馈社会。好，这位，两位同时举手，那我们女士先来，好不好？来。

观众：谢谢，张老师好，主持人好。中国的GDP发展的很快，不少外国人认为就是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经济早就应该是陷入困境的。但是现实情况是中国的经济不但没有陷入困境，反而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也被很多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经济之谜。想问一下张教授，就是中国怎么在面临这么多问题的情况下，仍然取得这么大的进步？

主持人何婕：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QE：我是学生。专业是国际贸易学。

主持人何婕：挺好，跟自己本行有点关系，请坐，中国经济之谜。

张维为：西方首先读不懂中国，照西方的逻辑，**我估计基本上每两三年就有一个大的舆论，说是中国即将崩溃，最有名是叫章家敦，他也很尴尬，一出来他就笑，他对中国崩溃的预测是精确到年和月。**当时WTO中国加入的时候，2001年他说5年之内中国将崩溃，5年到了，他说还会再晚1年，这当笑话讲了。**背后是中国自己形成自己一整套的做法，我叫中国模式，非常厉害的，这个模式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就现在这个水平可以跟西方模式进行竞争。**你比方说我经济上我是混合经济，我是政府的作用，包括中央政府，我们叫进行战略规划的中央政府和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两个层面的，再加上企业。所以中国经济它有三个发动机，一般的经济只有两个发动机，

主持人何婕：其实刚才这位朋友的担心，我想也是很多人的担心，确实我们听到很多观点说中国经济要不行了，我会怎么怎么样。所以大家也在担心，担心自己也担心国家。但事实上我们一路走来说明我们还是有很多经验，我们在处理很多问题，这些隐忧我们也在关注。所以还是要有信心的。

马泽晨：这就是中国。

主持人何婕：对，这就是中国，说得很好。好，我们这位朋友。

观众：您好张老师，主持人您好！谈到贫富差距，当有个人问你，他不问你收入做什么行业，他就问你居住在哪里？你说我住在郊区，比如说你住在南汇，居住在航头，人家说这个人肯定就是没有什么收入，本身就是一个中低收入的人群。

主持人何婕：您是住在航头？

QF：对。我本来是居住在市区，黄浦区的，就是说这样一问会不会贫富差距，人家说有钱人都是居住市区的，都是市中心，寸土寸金的。没钱的只能在边远的城市，城郊结合部这样一个看法。

主持人何婕：请坐，他其实讲的还是个体的感受。

张维为：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文化层面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你看过去中国改革开放三四十年，特别住房情况的变化，实际上也许说不定回头看你的选择是最好的选择**。真是这样的。另外你是上海本地人，所以你的概念比较强，历史上就这样，一百年前也这样的，上海叫上只角，下只角对不对？就是好地段坏地段，这个在上海特别强，英文叫snobish，就是非常势利，这是大城市的毛病。实际上这个完全可以摆脱的，你看现在新上海人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个地方好，毕竟你看浦东，我现在住在浦东，你回头看40年前，谁想愿意住到浦东？现在浦东多时髦的概念，对不对？那航头以后不得了的，我去过，你还有一个古镇我跟你说，那个文化资产发掘出来以后，那地方跟今天周庄什么一样的，多少人会羡慕，你住在古镇边上。**所以我觉得文化概念真是可以变迁的，而且我们看到它这样一步步变的。**

主持人何婕：其实跟这位朋友讲的，我其实可以例举出很多条住在航头的好处，对不对？空气也比市区要干净一点，另外你上下班不太拥堵，买个菜什么的也都很方便很安静，一点都不会受市区的这种干扰，所以刚才张老师说了，越是随着发展，你越是会觉得以往你觉得好像不太足的地方将来都会变成优势，它是一个不停地在转换的过程，所以我希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中国的发展当中享受这种转换，享受这种新的意义的挖掘，这个特别棒。张老师，我们说到观察中国不要盲人摸象，最后也想问一下您还有什么期许想跟大家讲？

张维为：我就觉得，就是指标体系创新刻不容缓。西方玩这个玩得是炉火纯青，动不动就弄个指标，一看看这是破绽，到处都是破绽，但它也敢用。**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这一块我们的学者第一不要被他们忽悠，要形成自己的指标体系，要用这个指标来看西方，看整个世界。**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